

1952—1953年整修南洞庭工程中的劳动竞赛

陈向科, 王健, 邝小军

(湖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劳动竞赛是集体化时期动员民众的载体、提高工效的利器。在 1952—1953 年整修南洞庭湖工程中, 针对民工消极、畏难的思想实际, 工程指挥部通过思想发动、典型培养、合理化运动等措施, 将民工动员工作与提高民工的劳动效率结合起来, 开展了一场爱国治湖劳动竞赛运动。这场劳动竞赛提高了民工的思想认识, 激发了民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推动了工程的顺利竣工, 同时也对后续的乡村发展和经济社会建设带来了潜在影响。

关键词: 集体化时期; 南洞庭湖; 劳动竞赛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0)03-0035-07

Labor competition in the south Dongting renovation project from 1952 to 1953

CHEN Xiangke, WANG Jian, KUANG Xiaojun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Labor competition is the carrier of mobilizing people and the weapon of raising work efficiency during the period of collectivization. From 1952 to 1953, in the projects of renovating the South Dongting Lake, in view of the ideological re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passivity and fear of difficulties, the project headquarters launched a patriotic labor competition campaign to better control the lake by combining mobilizing migrant workers with improving their work efficiency through the measures of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fostering models and rationalization movement. The labor competition has improved the migrant workers' ideological awareness, stimulated their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promoted the smooth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and also exerted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subsequent rur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South Dongting Lake; labor competition

集体化时期的劳动竞赛, 又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或生产竞赛, 与革命战争年代的各类竞赛运动一脉相承。在中共开辟和坚守中央苏区根据地时, 竞赛运动“成为中央苏区动员民众极有力度和效度的有效载体”, 还成为“革命前进的动力阀, 或成为革命氛围营造的压力阀”^[1]。陕甘宁边区时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 实际也是一次劳动竞赛运动, 涌现出一大批吴满有、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解放战争时期, 为巩固东北根据地, 中共开始有计划地在工人中组织劳动竞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伴随着抗美援朝运动, 各个行业形成“生产战线”。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开展

起来, 具体措施包括组织生产竞赛、提合理化建议与推广先进经验等^[2]。在工业战线, 劳动竞赛是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常见手段。这类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之所以受到青睐, 是因为其为国家“在意识到企业(单位)外部与市场隔离、内部缺乏自主经营权和增效动力的体制缺陷时采用的一种针对劳动者的激励增效办法”。不过, “国家未能有效地减少单位组织及其成员的体制内博弈行为所带来的损耗”^[3]。

学界对集体化时期在农业水利战线开展的劳动竞赛的研究, 其议题主要集中于“民工动员”“大会战”“工效运动”^[4-6], 较少专题论及“劳动竞赛”。为此, 笔者拟以 1952—1953 年整修南洞庭湖工程中的劳动竞赛为个案, 从微观视角透视集体化时期农田水利工作在基层社会的实施和成效以及贯穿其中的农民思想教育, 为新时代的水利建设、群众

收稿日期: 2020-02-15

基金项目: 湖南农业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陈向科(1975—), 男, 湖南华容人, 历史学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水利社会史研究。

动员提供借鉴。

一、劳动竞赛的缘起：工程的紧迫性与民工思想的波动

1952—1953年的整修南洞庭湖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湖南最大的水利工程。起因为1952年9月的南洞庭湖溃垸灾害。由于当年秋汛持续40多天,洞庭湖区洪峰一直未退,堤基受浸过久;9月24日晚发生九级大风暴,浪头越堤而过,导致南洞庭湖区域湘资尾闾大部分堤垸相继溃决,淹没耕地20余万亩,受灾人数达10余万人。湘阴县受灾尤甚,“共溃36垸,淹田8.63万亩,受渍面积19.96万亩。”^[7]“5万多人无家可归,由于是黑夜溃垸,从天气突变到溃垸,只有几个小时,人们来不及准备,造成的损失大得很,1600多人被洪水吞没,沿堤的各个角落,遍布尸体,真是惨不忍睹。”^[8]灾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10月17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委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赴湖南慰问灾区群众并调查研究治理洞庭湖之策。随后,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湖南省的要求和傅作义一行提出的意见,迅即作出整修南洞庭湖的决定。11月10日,成立南洞庭湖整修工程委员会及整修工程指挥部(以下部分简称“指挥部”)。工程自12月10日开工,到1953年3月20日竣工,历时100天;共动员21个县市群众25万人、各级干部1万余人参加。完成土方2467万立方米,石方22万立方米,投资1800多万元^[9]。通过有计划地修复溃垸,并48个小垸为3个大圈,使湘、资两水尾闾湖区堤垸从此定型,减轻了湘、资尾闾历史性的洪水威胁,为南洞庭湖区域人民创造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也拉开了新中国治理洞庭湖的序幕。

从整修南洞庭湖工程的筹备和实施看,筹备1个月即开工,25万民工的动员集中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开工以后,民工思想动摇,情绪不稳,一度出现较严重的装病不出工、私自逃回家的现象。

首先,在认识上,非湖区的民工认为整修洞庭湖工程与自己没有多大关联。整修南洞庭湖,对湖区受灾农民而言,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而在非湖区的民工看来,这“是滨湖人民的事情,和别的地方有什么关系呢?”有些来自山区的民工干脆直白地说道:“整修南洞庭湖与自己没有关系,这个‘粮

仓’是帮别人修的。”“国家花巨大代价修工程,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10]应该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新解放区土改的开展、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农民分到世代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对毛泽东主席、共产党充满崇拜和感激,愿意听从党的号召,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但国家意识、集体意识还不强,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常处于矛盾纠结之中。自然,“修湖和他们的利益结合得不大明显,农民不易体会。这和领导农民斗争地主以及领导他们开展爱国增产运动是不同的:斗垮一个地主,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立即可以得到好处;搞爱国增产运动多收的谷子不多征粮,利益直接明显,因而也好发动。”^[8]而整修工程与很多农民没有直接关系,民工又是在短时间内被动员到工地,他们的劳动热情显然难以持久,思想容易松动。

其次,在施工中,困难重重,民工存在畏难情绪。客观而言,整修南洞庭湖工程存有一系列困难:一则,工期紧任务重。从1952年12月中旬开工,必须赶在来年春耕、湘江春水泛涨之前竣工。在短短两三月内,没有机械设备,全部工程靠肩挑手挖,需完成土石方近2500万立方米;再则,施工难度大。因地势低洼且临水,新堤的堤基难以稳固。“首先得挖出丈把深的淤泥挑到三百米外的地方堆起,然后再从二百米远的地方运来新土,一层层地筑起长堤。”^[11]有的“施工地段低洼,清淤扫障任务艰巨,菱角、螺壳满湖,淤泥3米多深,要穿过950米湖心填筑新堤,施工非常困难。”^[8]“新堤要跨湖修筑,水深淤泥厚。最深的水有3米,最厚的淤泥有7米。施工时,民工们冒着严寒,要下到水里用泥船一船船推,水桶一桶桶提,箬箕一担担挑,把淤泥搬开后再填干土。淤泥过厚、范围过大的,就采用先清除表面淤泥,后用集中推土挤淤的办法施工。”同时,气候严寒,雨雪交加,增加了工程难度。尤其是1953年入春以后,“春雨增加,河湖水位提高,险堤塌陷现象严重。”“雨雪连绵,堵口工程的围水堤相继发生漫溢和溃决;部分低洼工地及土场,亦被水浸淹。”^[9]

面对以上种种困难,缺少修堤经验的民工容易望而生畏,产生思想波动和情感焦虑。“当他们看到又高又宽又长的新堤大样时,便和农村修塘修坝相比,因而恐惧不安。”^[12]“民工、干部均缺乏治

湖经验,有的民工站在堤线标高面前一比,堤顶比自己身高 6 倍以上,因此望而生畏,情绪极不稳定。”岳阳“五大队三十五中队,12 月 24 日在工棚装病不出工的有 23 人,三大队两天内跑掉 14 人。”^[13]许多民工甚至对于整修工程能否顺利完工心存疑虑:“洞庭湖那样大,从古以来就没有人修过,是不是修得好?”(据 2007 年 7 月 15 日对陈天祐老人的访谈记录。陈天祐,男,1932 年生,湖南华容人,为 1952—1953 年整修南洞庭湖工程民工,见《“挑堤”记忆:整修洞庭湖堤垸民工口述史料(2007—2018 年)》,未刊资料)“来到工地看到,工程这样大,暗地里想只怕完不成。”参加了砌工组,砌也打不好,思想上更发动摇起来。”^[14]“不大相信:溃了这么大的地方,一口气能修得起来?”^[9]

最后,在生活上,民工存有诸多不适应。从家乡到工地,从家庭生活到集体生活,从个体单干到编组劳动,从自由散漫无拘束到准军事化管理,从合家团聚度春节到工地统一过新年等,民工大多感到不习惯。“民工生活习惯上安土重迁,不惯于集体纪律生活,因此滋长了怕冷、怕苦、怕误生产的思想。”^[8]浏阳“山区民工不习惯于滨湖气候,因生活艰苦或不服水土,有 138 名民工逃跑回家。”^[15]“农民都有过旧历年的老习惯,民工离家日久,到春节就很自然地要产生回家过年的思想。”^[8]“当春节期间,他们便想起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有的说,‘身在外心在家,家中留着一枝花。家中生产没人管,手中没钱早回家’。有的说,‘儿在东,母在西,儿东母西两分离’。”^[11]

此外,还有一些破坏分子进行捣乱,滋扰民工动员工作。在民工刚到工地、生活不稳定时,破坏分子便乘机造谣惑乱民工思想,扩大修堤治湖困难,煽动罢工总工逃亡。益阳总队就有“地主向青年团员造谣说:共产党只有五年天下,毛主席有 8 年天下,你别修堤了,修完堤共产党就会把你杀掉。”还煽动民工:“咯样搞,将来完工时,只能剩几根骨头回去。”“只管跑,冒关系,国民党时枪毙都要跑,莫说人民政府是不打人、不骂人的。”沅桃总队也有“帮会分子宋春初拉拢三十个落后民工,在工地旁边开会,策动集体逃跑,说我们要回去,在这里干什么?连饭都吃不饱,住在外边天气又冷,政府是欺骗我们。”1952 年 12 月份,自民工

到达工地后,各种事故多次发生,根据益阳、平江、湘阴、浏阳等 8 个县总队不完全统计,短时间内达到 60 起^[16]。

以上情况表明,亟需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一种有效的组织动员方式,提高民工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稳定民工情绪,使他们逐渐适应工地环境,对完成整修工程任务充满信心,进而激发出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若非如此,不惟工程不能如期竣工,还将给同期进行的抗美援朝运动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指挥部决定,针对民工的思想实际,将民工动员工作与提高民工的劳动效率结合起来,开展一场颇有声势的爱国治湖劳动竞赛运动。

二、劳动竞赛的实施:思想与行动的“革命”

1953 年元旦节,整修南洞庭湖工程指挥部正式实施爱国治湖劳动竞赛运动。经过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多次修改补充,订出个人计划、小组计划、分队计划、中队计划、大队计划、总队计划,以及各个不同劳作单位或个人的竞赛计划,将民工的“奋斗目标、高涨的情绪用计划固定下来,使饱满的情绪紧密地结合起定型的具体行动纲领与奋斗目标。”之后在人与人、组与组、分队与分队、中队与中队、大队与大队,及挖工、挑工、砌工、踩工、炊事等各个劳作之间,进行纵横穿插的挑战竞赛。为顺利推动劳动竞赛的实施,指挥部通过深思熟虑,采取了宣传动员、典型培养、合理化运动等措施。

1. 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指挥部结合学习赴朝慰问团代表的报告和人民日报《迎接一九五三的伟大任务》的社论,反复说明劳动竞赛的政治意义,指出劳动竞赛是抗美援朝和迎接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具体爱国行动。自上而下召开分指挥部扩干会、总队民工代表会、大队民工代表会、中队全体民工会及小组讨论会;自内而外召开总队党总支扩大会、支部党员大会及总队青年团代表会议、青年团支部大会,提出“人人立功”“事事立功”的口号,详细讲解评选模范及奖励办法;代表、单位和党团员宣誓、表决心、提保证、进行挑战竞赛,形成热火朝天的爱国劳动竞赛热潮。

在具体的宣传动员过程中,指挥部采用了民工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一是群众性的工地鼓动。在南洞庭湖工地上,运用得最广泛的宣传工具有广播筒和有线广播、黑板报、读报组、工棚文娱、幻灯放映、图片展览以及轮夺红旗、鼓动牌、窍门牌、英雄榜等。其中,“广播筒是工地最普遍、最有效的宣传鼓动工具。”据统计,全工区有988个,差不多每个中队都有一个。“有些中队干部或宣传员,经常在挑土时把广播筒吊在屁股上,随时进行宣传鼓动。”^[14]广播的内容主要为表扬模范、介绍先进经验、传播挑战迎战消息等。广播时,大多运用简短有力的鼓动口号和快板、山歌等形式。二是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如有湖南省文工团与军区文工团的巡回演出。“他们在五百里堤线上巡回演出118场,受到热烈欢迎。”有来自长沙、益阳、汉寿各地的民间说唱艺人组成的弹词组,分成8个小组到各个工棚巡回说唱。有电影队,分为13个队,带来25部影片,分工段巡回放映。“有许多民工看到《陕北牧歌》中成宝娃和白秀兰受地主的压迫情形,引起了心灵的共鸣,流下了热泪。宁乡五大队在动员劳动竞赛时,就是从讨论《陕北牧歌》入手,启发、回忆、对比、诉苦,对提高民工阶级觉悟,树立战胜困难完成任务的信心,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各总队还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农村剧团团员和旧花鼓戏班子的成员,全工区统计达4157人,占全体民工的2%以上。他们带来1055套锣鼓,平均200人一套锣鼓。他们组织起来以后,便带领民工进行日常的文娱活动。譬如桃江总队成立了74个文娱小组,以分队为单位进行了打围鼓、三棒鼓、唱调子、教歌等工棚娱乐。总队制订“工余剧团组织章程”,成立5个剧团,总计演出24场,平均每个民工观看3次^[9]。另外,指挥部在宣传中注意从实际出发,把民工的切身要求和国家建设的总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如提出“早完工早回家生产”这一符合民工切身利益的口号,反映了民工的普遍要求。“‘早完工’,可给国家多节省人力财力物力,避免浪费;同时,完工以后,大家可以早回家生产,做到治湖生产两不误,争取明年丰收,多打粮食,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9]这样,把民工的切身要求提高到爱国主义的认识上来,使广大民工对祖

国、对劳动充满深厚的感情。

2. 培养典型,推广先进经验

指挥部树立了劳动竞赛的一批先进典型,最有影响力的是李祖范小组和陈代杰小组。李祖范是桃江总队六大队五中队三分队副分队长。“桃江总队民工因均系山区农民,对修堤毫无经验。开工初期,在劳力组合、施工配合、技术掌握上都存在许多问题,工程进展缓慢。”“五中队开工后9天工效平均只有1.21方。”李祖范十分焦急,“开始考虑到劳动组合和操作方法的改进问题。12月21日,他在报上看到益阳12大队按劳编组后工效提高到4.8方的消息,马上和全队民工商量仿效。分队青年多,好胜心强,傅希元等主张试试看,但有些民工保守思想严重,谢庚松坚决反对说:‘都是吃半升米,冒得咯号事。’不相信报上消息。”李祖范耐心解释,说服所在分队“照样做一做看”。经民主讨论,自愿结合,按劳动力强弱编成若干小组,创造了“人均5.2方、全工区挑土的最高记录”。陈代杰是宁乡总队五大队七中队小组长,他时常组织组内进行“三比”教育,使全组民工情绪饱满,真正认识到爱国治湖的意义。并且,“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合理化建议,吃茶和休息时间,也共同研究工作、检查工作。看比昨天挑得多还是少?研究挑得少的原因,总结挑得多的经验。”他关心组员们的生活,又能发动大家想办法。“组员潘正佳病了,他每天出工以前去慰问一次,下工后一放下箩筐就去慰问;1月2日,他和组员们的衣服都被雨淋湿了,他怕别人穿湿衣服害病,先替别人烤干才烤自己的。大家都说:‘我们的组长好!’全组互助友爱、团结一心,组员们说:‘我们这里是不吃住人,不打击人,十个人一条心。’”^[9]

培养典型之后,再采取层层设点、组织参观、介绍经验、展开讨论、制定计划的办法逐渐推广。“如桃江总队召开了1200余人的交流经验大会,由李祖范作典型报告,全总队先后共出现李祖范式的小组416个;常德总队采取培养典型、比较参观、报告经验、制订计划等办法,也先后出现李祖范式小组312个。”此外,还涌现出上千个向李祖范小组、陈代杰小组学习的“百战百胜英雄中队”“钢铁小组”“夺红旗小组”“模范小组”等^[17]。尽管民工的保守思想非一朝一夕可从根本上改变,但是像

李祖范小组与陈代杰小组及其摸索的先进经验,是民工所熟悉的具体的的人物和经验,“群众亲眼看到、体验到他们先进工作方法的好处,因此自觉地以他们为学习的榜样,形成了学习先进经验的热潮”,从而渐渐打破了保守思想^[18]。

3. 优化劳动力组合,开展合理化运动

合理化运动主要是指劳动力组织上的合理。在没有使用机器的情况下,修堤、堵口、开河、创堤等工作是一种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劳动队伍多是农民,劳动方法全靠人力挑土,生产方式落后;民工成员体力强弱不一,年龄大小不一,政治思想觉悟高低不一;劳作种类多,如炊事、杂工、挖工、挑工、检踩、打碓等,各个劳作环节所配备的人数比例必须适应、合理,否则会形成浪费人力的现象。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要想发挥每一个民工的积极性,发掘广大民工的生产潜力,就必须解决人和人的关系问题、劳力大和劳力小的关系问题、劳动和报酬的关系问题。因此,指挥部决定,根据每个民工的技术等特长和劳动强度,在各个劳作环节作适当的分工;将原来的混合编组关系打乱,改为劳力大的编为一组,劳力小的编为一组,实行按劳取酬原则。常德分指挥部“共组织了 5 423 个小组,参加小组的共 59 203 人,占整个民工的 59.6%。”同时,还提出“精打细算,处处合理”“消灭闲人、减少杂工”“人不等土、土不等人”“工作修堤两不误”“不作杂工就挑堤”等口号,发动民工针对自己单位各个劳作环节人数比例不合理的具体情况,展开深入的讨论。经过大小会议的讨论,集思广益,普遍调整了各个劳作环节人数上的比例。“炊事员一般的一个中队由七八人减到三四人,运柴米的杂工也大大减少,有的中队提出‘收工以后挑担柴’,将运柴米放到工作以外的时间进行;挖土的人数比例做到合理,消灭了人等土、土等人的现象。检踩工普遍增多了,一般的都是一个中队七八人,保证了工程质量。打一架碓的人数也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打一架抬碓十人较合理,打一架片碓八人较合适。”^[9]

合理化运动是劳动竞赛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只单纯地开展竞赛,忽视合理化,则竞赛的情绪不能持久,它将因受种种不合理现象的阻碍而影响民工的劳动热情;如果只单纯合理化而忽视竞

赛,也将使合理化运动失掉明确的方向和有利的支持,不能发挥高度的劳动热情发掘生产潜力,工效也不能提高。”^[9]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劳动竞赛也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单纯图快和忽视工程质量的偏向。如“拼命主义,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常德总队有的大队每日出工时间十五六个小时以上,总队领导不但不加制止,反而添置马灯,鼓励这种行为。”“忽视工程规格,降低工程质量。为了赶任务,很多单位减少了打碓、检踩人数。土填得厚,碓打得马虎。”^[8]不少工区“清淤泥、取土、填土、检踩、打碓等工作,都未依照施工须知的规定进行。进土不加选择,出土随便乱堆,堤基未能很好清整,填土不打碓,以致挑成‘糖包心’,结果造成很大的废工和返工。”为此,指挥部连续下发《为纠正急躁思想、草率作风、提高工程质量的指示》《关于保证搞好爱国治湖劳动竞赛的指示》《关于开展爱国治湖劳动竞赛运动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关于爱国劳动竞赛中各级干部应随时注意民工安全的通知》等,及时扭转了拼命蛮干偏向,确保了劳动竞赛运动的健康发展。

三、劳动竞赛的成效:激发劳动热情与提高工效

作为一项深刻、实际、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劳动竞赛提高了民工的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激发了民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体现了民工的爱国意志与革命要求,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水利建设经验,提高了南洞庭湖整修工程的工效,确保了工程的顺利竣工。

首先,提高了民工思想认识,鼓舞了劳动斗志。在劳动竞赛中,由于时时处处对民工进行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民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劳动情绪日渐高涨。25 万民工“参加的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整修南洞庭湖的工程,亲眼看到党和政府如何关切和救济灾民,如何爱护民工身体与关心群众生活,因此,更深刻和更亲切地了解到毛主席、共产党、人民政府是怎样迫切地在为人民服务,也更清楚地理解到个人前途与祖国建设的前途是不可分的,大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增加了祖国建设的信心。在运动中发

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表现了无比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概。”^[18]如在连续15昼夜的王家河堵口战中,湘阴民工喊出了“王家河不听话,我们就管制它”的口号。望城民工在塞梓庙堵口工程中遇上大风雪,没有一个叫苦,相反地,他们喊着:“天撒盐,我加油,任何困难都不愁。同志们有的是决心,哪怕堵口不成功。”这些口号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充分表现了翻身农民的阶级觉悟和英雄气概。岳阳民工引用了志愿军们“遇到敌人,就是立功的时候!”这句豪语来鼓舞自己的劳动热情,“我们修湖也一样,遇到困难,就是立功的时候!”鼓舞民工战胜一切困难,胜利完成任务^[18]。

其次,激发了民工创造性,积累了水利建设经验。在劳动竞赛中,由于指挥部注重激发群众性的智慧和力量,全体民工发挥了积极性、创造性,在劳动力的组织、施工方法以及工程技术等方面,创造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先进经验。如在劳动力组织方面,民工创造性地摸索出“按劳编组、砍土分方、评工计分、按分发钱”方法。该经验推广后,“证明是足以发挥劳动潜力、提高劳动效率的良好方法,因为它在组合原则上解决了劳力强弱不均的问题,在取酬方法上又解决了劳动和报酬的关系问题,这样就使参与工程的每一成员都能充分发挥其劳动积极性,而使工效迅速提高。”在施工挑土上,有李祖范的“三快”(担得快、挖得快、倒得快)“一满”(装得满)法,“路直土场宽,掌握上午慢一点,下午抓紧,散工时再一鼓作气挑一阵”;在修路上,有“蜈蚣路”“孔明路”的不同;在打碓上,有“一字路”(抬碓开路打一字形)“梅花点”(飞碓压花与抬碓交错进展)“鱼鳞片”(一花压一花)“一掌平”和“一稳二平三下高过头”的做法;在节省烧柴烧煤上,有“品字灶”“一字长蛇灶”和“梅花灶”的发明,节省了四分之三的燃料费,转移作菜金^[19]。总之,这些先进做法都是民工“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的产物,在工程中起着巨大作用,也为之后的水利建设储备了宝贵的经验。

最后,提高了工效,确保工程如期完成。劳动竞赛开展以前,劳动力组合搭配不合理,“劳动力强的与弱的混在一起担土,不评工计分,每天出一个工算一个工。因劳动力相差很远,强的不起劲,不能充分发挥力量。弱的赶不上,身体吃亏太大,

因此工效很低。”“炊事员、杂工一般都过多;挖工和挑土的人数很不合理,在同样的运距上,挖挑人数的比例出入很大,因此,不是挖不赢,就是挑不赢,不是土等人,就是人等土;检踩的人一般的都是少,一个中队只四五人,他们检踩不赢,严重妨害了工程质量;打一架碓的人数不等,少的6人,多的16人,有吃亏的,有浪费的。”加之,民工思想认识水平暂时没有提高、情绪波动等,各总队一般工效都很低,“常德工区平均工效为1.38公方,湘潭工区则仅及0.987公方,以当时85%的出工率计算,需要96个工作日方可完成任务。”^[19]

劳动竞赛开展以后,大大激发了民工的劳动热情,队与队、组与组间广泛掀起了挑战赛,同时,合理组织了劳动力,推广了先进经验,因而工效显著提高。至1953年1月21日,“常德工区平均工效即提高到2.26公方,比竞赛前的工效增加了60%以上。湘潭工区元月份的平均工效是1.485公方,2月份是1.885,后增加到1.919,比运动前提高94%。”整个工区“由开工初期的平均工效0.8提高到2.0方。”^[19]可以想见,若不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全面大幅度地提高工效,25万劳动大军要在短短的100天时间里(1952年12月10到1953年3月20日,其中大小雨工20余天,实际只有70多个工作日可以施工)顺利完成工程是不可能的。

四、余论

1952—1953年整修南洞庭湖工程中的劳动竞赛,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动员民工和提高工效的群众运动。这是当时全国普遍开展的农田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对乡村发展影响深远。对洞庭湖区农业而言,劳动竞赛催生了湖区系列堤垸整修工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湖区“粮棉农业模式”的发展,但也导致湖区对该模式过度依赖而难以转型;对农民而言,参与劳动竞赛的民工“更深切地体会到个人前途和祖国前途是怎样密切地结成一体,更加清楚地看到祖国建设无限美好的前途”,“进一步认识了党的伟大,认识了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为人民兴修这样大的水利工程,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保证治湖工程的彻底胜利”,“普遍认识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和集体劳动的好处,亲身的体验告诉他们:只要大家团结互助,办法就多,力量就大,任何困难都能克

服。”^[9]这又进一步密切了广大农民与党和国家的关系，加深了他们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并为之后踊跃加入农业合作社、响应人民公社成立等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党和政府而言，通过劳动竞赛运动顺利推进大型水利工程的实施，减轻洪涝灾害的危害，创造有利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既贯彻了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也巩固了政权，树立了威信，还锻炼和培养了大批骨干，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

还应该看到，集体化初期劳动竞赛这种运动式的集体劳动得以开展并发挥实效，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如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与当时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抗的国际背景下形成的“大敌压境，国难当头”氛围；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方兴未艾，村集体组织尤其是生产队成为组织劳动竞赛的主体和后盾；刚刚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的农民思想淳朴，热情高涨，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而且青壮劳动力几乎全部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宣传教育的扎实有效，注重对民工进行深入细致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思想教育，解决民工实际困难和满足其实际需求，既讲“主义”，又兼顾“利益”，有效地激发了民工主人翁精神，等等。若脱离这些条件，在经济社会建设中一味地照搬劳动竞赛形式，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驱动，或空泛地进行理想信念的精神激励，或全凭物质刺激，会在短时间内产生一定效果，但往往会因动力不足而难以持续。

参考文献：

- [1] 谭琪红，陈信凌．中共革命时期民众动员的生成机制——从中央苏区竞赛活动说起[J]．江西社会科学，2017(6)：142-151．
- [2] 董志凯．抗美援朝与新中国经济[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5)：24-32．
- [3] 林超超．生产线上的革命——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业企业的劳动竞赛[J]．开放时代，2013(1)：146-164．
- [4] 王瑞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田水利建设[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1)：126-138．
- [5] 吕志茹．集体化时期的水利“大会战”——以根治海河为中心的考察[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3)：87-94．
- [6] 李安峰．集体化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工效运动——以昆明市为例(1957—1960)[J]．学术探索，2019(8)：130-137．
- [7] 湘阴县志编纂委员会．湘阴县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5：141-154．
- [8] 整修南洞庭湖工程回忆[J]．回首当年，2007(5)：175-176．
- [9] 湖南省南洞庭湖整修工程指挥部．整修南洞庭湖[Z]．1953：85-86；24；57；237；117；119；122；123-124；125；180-197；90；54-55；20-22．
- [10] 湖南省南洞庭湖整修工程指挥部．工程报纸剪贴(1952—1953年)[A]．湖南省档案馆：203-1-9．
- [11] 朱开云．想起整修南洞庭湖长堤[J]．老年人，2011(2)：79．
- [12] 湖南省南洞庭湖整修工程指挥部．湘潭分指挥部政治处政治工作总结(1953年3月12日)[A]．湖南省档案馆：203-1-4．
- [13] 李儒风．回顾整修南洞庭湖[J]．岳阳文史，1995(9)：92-93．
- [14]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临湘总队四个新党员座谈感想[N]．南洞庭报，1953-03-19(01)．
- [15] 浏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浏阳县志[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980-982．
- [16] 湖南省南洞庭湖整修工程指挥部．1952年12月份保卫工作报告(1952年12月31日)[A]．湖南省档案馆：203-1-3．
- [17] 湖南省南洞庭湖整修工程指挥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总结(1953年3月22日)[A]．湖南省档案馆 203-1-3．
- [18] 三个月治湖工作收获不小 桃江支援大队民工漫谈感想[N]．南洞庭报，1953-03-19(02)．
- [19] 湖南省南洞庭湖整修工程指挥部．关于劳动竞赛运动的报告(1953年3月18日)[A]．湖南省档案馆 203-1-3．

责任编辑：曾凡盛